



刘向文献编纂活动的全景展示

——评李景文著《刘向文献编纂研究》

□王佳琦*

摘要 《刘向文献编纂研究》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刘向于西汉成帝时期开展的皇家文献整理活动重新审视,全面探讨其从事文献编纂活动的全过程。全书以刘向文献编纂活动、编纂思想、学术贡献及文化传承角度为切入点,提出其在整理官方藏书时采用的“校讎+编纂”模式;回望历史,以西汉政治史和学术史为背景,重新审视刘向在文献编纂工作中表露的儒学思想和济世情怀;系统总结了刘向在开启“定本时代”与构建古文献学科方面的贡献,彰显刘向在中国古代图书制度史、学科史方面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 刘向 编纂 校讎 定本时代

分类号 G256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1.05.013

河南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李景文先生的专著《刘向文献编纂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于2020年10月出版,是一部对西汉著名文献学家刘向一生从事文献编纂活动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研究》以文献编纂为切入点,重新审视了刘向整理皇家典籍、编纂《说苑》《新序》《列女传》的全过程,形成五十多万字的著作。该书洋洋大观,思路清晰,观点新颖。有鉴于对《研究》的喜爱,笔者尝试结合平时所学,对书中主要观点和内容特色作一浅显评介,以期引起相关学者对该书的研究和讨论,进一步深化文献编纂学和刘向编纂成就的相关研究。

1 “校讎+编纂”模式:新研究视角的切入

在此前研究中,大量学者均以“校讎”概念为切入点,总结、概括刘向开展的皇家藏书整理活动。自清末学者孙德谦在《刘向校讎学纂微》中将刘向的文献整理方法概括为“备众本”“订脱误”“删重复”等二十三例后,诸多学者均承袭其观点,以校讎的方法和原则审视刘向的全部文献整理活动。同时,“校讎”概念的确立与影响,导致部分学者在以“编纂”视角看待刘向的皇家藏书整理活动时,难以摆脱此窠臼。

有别以往,《研究》在重新审视刘向等人近二十

年皇家藏书整理实践的基础上,大胆提出“校讎+编纂”模式,借此归纳刘向文献整理活动的全过程。笔者认为,刘向“广收众本,校勘典籍字、词、句、篇的讹、脱、衍、倒为‘校讎’,排定篇目、确定书名、编撰叙录、编制群书目录为‘编纂’,‘校讎’是‘编纂’的必备条件,‘编纂’才是刘向文献整理的最终目的”^{[1](20)}。笔者深感《研究》的认知力透纸背,击中肯綮,不仅准确、新颖、高度地概括了“刘氏程式”的具体步骤,梳理了刘氏整理皇家藏书的诸多环节,而且对“校讎”与“编纂”之间的逻辑关系分析得也极为透彻。理由有二:第一,《研究》回归了刘向阐释“校讎”本义的初衷。刘向在叙录中对“校讎”做出了明确的解释,“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讎也”^[2]。刘向当年整理皇家藏书的任务极为艰难,他不仅要面对萧何从战乱中抢救的、西汉诸帝多次从民间征集的、躲过秦始皇焚毁的、绳断简残堆积如山,且“每篇独立,不相联系,即或无篇目,亦无一定之次序”^[3]的藏书现状,而且承担着将这些篇籍散乱、传抄多误、单篇流传、杂乱无序的散篇归拢到一块,让无序变得有序的责任。刘向深知校讎皇家藏书篇籍中的错、讹、衍、倒并非整理任务的全部,但他仍然清楚地阐释了“校讎”的含义,这充分说明刘向当初并没有将整理皇家

* 王佳琦,ORCID:0000-0001-5896-0395,邮箱:wjq96yt@163.com。



藏书的所有环节都纳入“校讎”之中。第二,《研究》审视刘向“校讎”之余,用“编纂”概括最为恰当。刘向整理皇家藏书,“校讎”只能说是完成了一半的任务,其余仍有篇名编排、真伪辨析、典籍命名、叙录撰写、目录编纂等大量工作要继续。清代学人孙德谦将刘向的文献整理活动归纳为校讎二十三例,可谓精细。其实,除“备众本、订脱误、删重复”属“校讎”外,至于“条篇目、分部类、辨异同、通学术、叙源流、……记图卷、存别义”等环节,已超越了“校讎”的范畴,显然都是在为“编纂”服务,因为刘向校讎完每部典籍后,还要编书(编定内容、编定篇目、编定书名)和编目(编纂叙录、编纂群书目录),只有将其编纂成定本,改变文献的形制和流布方式,才算完成藏书整理工作。若再做进一步分析,尤其像“其中的‘分部类、通学术、究得失、准经义、考师承’等例,实为刘向借校讎官藏典籍来总结各家学术、寻求西汉学术大一统之举措”^{[1](162)}。

此外,《研究》从编纂学角度对刘向等编校典籍方法的概括也值得关注。作者将刘向的编校方法概括为五点:“比勘各种异本,择善而从”“甄别学术异同,另行编纂”“梳理单篇散材,编订新书”“创制内、外、杂篇,区分旨意”“分辨语词音义,训诂相通”^{[1](169-181)}。其中,除“比勘异本”为从属于“校讎”的版本学概念外,其他的方法与原则均是校讎、编纂互相杂糅,并以编纂为最终归宿的。

《研究》中“校讎+编纂”模式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编纂”的研究视角显示出刘向文献整理工作与后世不同之处,更加突出刘向在文献学领域“第一人”的地位;第二,“校讎+编纂”模式表达着刘向文献工作的先后次序,揭示其文献整理全部实践;第三,将“编纂”纳入文献学下属学科分支,进一步扩大了文献学的学科内容,对该学科的建设大有裨益;第四,这一新模式的提出,对于摆脱已有的以“校讎中心论”归纳刘向全部文献整理活动的做法,具有创新意义。

2 宗儒与济世:对刘向学术、政治生涯的回望

诚如苏联学者伊·谢·科恩谈到的:“古人回答的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自己的问题”^[4]。可见,古代学者在著述中渴望解决的,是他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即使是欲将《史记》“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5]的司马迁,同样渴望在其著作中实现传布帝王圣德、留存先贤言论的目的。

古人在编纂图书时往往会受到社会政治现实的影响,刘向的皇家藏书整理活动也不例外。《研究》从编纂学角度入手,以刘向的文献编纂活动为案例,深入探讨了刘向对儒学发展的贡献,以及在文献编纂活动中体现的济世情怀。

2.1 刘向文献编纂活动与宗儒思想

《研究》通过对刘向文献编纂活动,尤其是对以《六经》为主导的儒家典籍的编纂,讨论了经学由民间传播到逐渐为官方正统接受、诸子学说为儒家学说所统辖的整个过程,还原出西汉学术发展的整体脉络。

有鉴于此,《研究》以其为个案,深入探析了刘向的学术思想。在《别录》中,刘向通过纂写序录的方式,介绍了诸子百家学者的生平、时代与思想,对书名的由来与含义形成解释,对典籍内容的得失做出评议。其中“评价典籍内容得失”的标准,即展示出刘向“尊儒”“崇儒”的学术倾向。如《叙录》的编纂,皆以“是否合于六经”来评判每一种典籍的优劣。

《七略》则更加清晰地展现了刘氏父子一脉相承的“宗儒”观念:首先,《七略》以“六略”“三十八种”“六百零八家”的分类方式统辖群书,将先秦以来产生的学派进行了系统梳理,以儒家为先,“从总体上呈现出以儒家经学统领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之学的格局”^{[1](344)};其次,《七略》在“总序”“大序”“小序”的编纂中,梳理经师流派,追溯诸家学术起源,创设西汉学术谱系,“不将孔子之《论语》列入《诸子略》,而将其归入《六艺略》”,“与记载古帝王之道的六经并列”^{[1](345-346)},推崇孔子之意昭然若揭。

《研究》对刘向的“宗儒”思想进行考释与总结:“刘向的学术谱系,在确立儒家统率地位的同时,又进一步强化孔子在经学中的地位”^{[1](345)}。作者认为刘向对孔子的推崇主要集中在对《六经》的梳理上,其在叙述《六经》的师承源流时,有意识地强化孔子编订《六经》的作用,借此提升孔子地位。在述及孔子与《六经》之间的关系时,采用“孔子编纂《六经》”而不是“孔子作《六经》”的说法,“盖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门初无著述之故也”^[6],肯定了儒家学术对三代以来“道器合一”理念的继承关系,声明了孔子的正统地位。由此出发,刘向在校勘典籍时,能够打破师法桎梏,以通博的文献观念遍采今古文学派的各类典籍,对皇家藏书予以校勘,令图书典籍的还原程度大大提高;在类目划分时,则于“六艺略”下分出“小学类”一项,认为“文字训诂学,



不仅是治经的基础,而且更是治经的根本”^{[1](320)}。无论是强化孔子的地位,还是坚持博洽的文献整理立场,均贯穿着刘向“以儒家经学为主导”“海纳诸子于经学”^{[1](344-346)}的思想倾向。刘向的文献整理工作,对于儒家“大一统”思想的进一步确立,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借用白寿彝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把诸子、诗赋、兵书、术数和方技都说成是出于王官之守,把诸子、诗赋都说成是六经的支流余裔而为衰世的产物,这里就贯穿了尊崇儒术的思想”^[7]。

2.2 刘向文献编纂活动与济世情怀

《研究》还以大量篇幅对刘向在编纂活动中体现出的济世情怀进行探究:刘向作为西汉宗室及士大夫群体中的一员,面对西汉末年皇权外移的情况,以编纂图书作为劝谏帝王的手段,试图利用对儒家经义的阐发,维护西汉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在整理文献的进程中,刘向充分利用手中的资料,编纂《新序》《说苑》《列女传》三部书籍,欲借书典故劝谏帝王勤政贤明、知人善任、远离女色。

作为体现刘向济世情怀的三部著作,《研究》以简明的文字说明了三部书籍的成书年代、著作性质、材料来源、编纂方法与体例等相关问题。作者充分吸收已有成果,在认为三部书籍为刘向“编纂”而非“著作”的基础上,对其编纂特点进行总结:三书蕴含的“正纲纪,迪教化”“以著述当谏书”的目的,在“以类相从”、阐释“义理”的编纂手法中得以体现;为强化劝诫功能,三书在篇章中遍引六经之文作证,依经立意;三书为突出刘向欲达之意,“杂采百家之言”,精心构思、巧妙编排,积累了大量异闻传说。透过对三书内容与编纂特色的梳理,《研究》展现出刘向浓厚的爱国忠君思想与济世情怀。

刘向对于官藏文献的整理,也带有相同目的。据《汉书》记载:“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8]。可见刘向整理群书,是由皇帝亲自任命,这项工作从一开始就带有为皇权服务的目的。作者紧紧围绕刘向服务皇权的意识形态,对其编纂群书、纂写《别录》时的思想倾向深入爬梳,认为刘向一方面通过上奏定本实现借书进谏的目的,另一方面则以儒家学术为纲,追求学术上的大一统。

《研究》关注了刘向从事文献编纂工作所体现出的儒学思想与济世情怀,呈现了先秦至西汉时期由百家争鸣到儒学独尊的整个过程,也折射出在“大一统”思想影响下儒学内部发展的全景。

3 开初与鼎新:刘向学科贡献与“定本时代”的开启

虽说早在西周时孔子编删“六经”已开私人古文献编纂之先河,但孔子的编纂仅限于“六经”;严格意义上的群书整理工作要从刘向开始算起,可以说刘向开辟了文献学这一在当时来说仍是全新的领域。《研究》以已有研究成果为根基,更加系统深入地阐释了刘向对构筑古文献学基本理论所作出的贡献,并认为,刘向文献整理工作,令古文献学诸多学科分支走向成熟。刘向通过时间跨度较长的文献校勘编纂活动,为后世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类分文献,编写目录,确立中国目录学的编纂体例,为目录学家们沿用至今;比对异本,校勘讹误,形成后世校勘学的一般方法;网罗众本,依据版本来源对副本进行归类,为后世版本学奠定基础;辨别一书真伪,建立起辨伪学的认知体系;编辑文献定本,纂写群书《叙录》《七略》,成为编纂学的发端;规范编校步骤和方法,形成“刘氏程式”,成为后世文献整理工作之圭臬。“刘向有目的地设定六大群书类别,有条件地规范校讎步骤和方法,有计划地广收众本,有把握地辨别真伪,有格式地编纂每书叙录,说明他对版本、校讎、辨伪、目录、分类、编纂过程的认知已经升华到一种理性的思考,即从方法和理论上去探讨文献整理规律,从而使中国古典文献学架构下的分支学科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辨伪学、编纂学的理论边界更加清晰”^{[1](2)}。

围绕刘向编纂书籍定本的全过程,《研究》认为其通过“以类系书,编纂群籍”“以人系书,编纂全集”“灵活变通,开创新例”“条理篇次,形成定本”^{[1](424-429)}的方式,将先秦以来无序的文献有条不紊地汇集起来,令文献在内容、文字方面呈现出清晰面貌,从而开启文献的“定本时代”。作者指出,“定本时代”的开启标志着文献形态的改变:此后,简帛书籍形成了鲜明的体例,书名、篇名、作者名成为书籍的重要部分,书籍制度从此开始逐步建立;先秦时期单篇流行的文献被以定本形式确立,散佚情况大大降低,令后世学者无论是研习还是传抄先秦经典,均有范本作为依托。刘向团队杀青、缮写的简帛,虽已随着历史的嬗变“灰飞烟灭”,但内容却因定本的确立经由历代学人之手传承至今,有力推动了中华文化的赓续。“这一划时代巨变影响了中国书籍史两千多年,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沿用刘氏父子确立的书籍制度”^[9]。《研究》对于“刘向开启定本时代”的阐明,对于图书制度史相关研究具有启发作用。



定本时代的开启,对知识传播方式产生了影响。《研究》也通过对先秦至东汉知识传播形态的梳理,展示刘向在文化传播方面的贡献。作者首先梳理了先秦至西汉时期的传播模式,先秦时期图书多以口头传播与文本传播的方式并行,二者处于彼此转化与制约的态势当中。汉代的建立令文本传播的规模超越了口头传播,但文本形式、内容的不统一仍对其形成阻碍。作者在书中认为,刘向作为定本模式的缔造者,对知识传播模式的演化功不可没。《研究》虽未使用相关的传播学术语,但以通俗的语言分析了刘向文献工作的传播价值:从符号角度看,刘向对文献的编纂改变了文献的散乱形态,令信息从无序迈向有序;从传播渠道看,刘向对馆藏文献的整理影响了图书存藏,使士人和百姓得以借此机会一睹中秘藏书的真容;从传播媒介看,刘向文献工作加速了传播媒介从语言向文字的转变;从传播方式看,知识能够从组织传播向大众传播过渡,刘向功不可没。

作为一部系统研究刘向文献编纂活动的专著,《研究》在提出“校讎+编纂”新模式、更新旧有观念基础上,将刘向放置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探讨其编纂思想、学术贡献、文化传承,对于深化刘向的相关研究具有较高的价值。

总之,《研究》围绕刘向整理皇家文献、编纂《新序》《说苑》《列女传》的全过程,以“编纂”为切入点,着重分析刘向在编纂活动中采用的方法、原则,以及

从中体现的思想与情怀。全书资料丰富,引证详实,全景式地展现了刘向编纂活动的每一细节。该书文字真挚朴实,行文流畅隽永,读来毫无生涩之感。作者具备深厚的文献学及史学素养,既见微知著,对学界争论的一些问题阐发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极富启发性;又拓宽视野,从刘向编纂活动出发,全面勾勒出先秦至西汉时期文献编纂学的整体发展面貌,展示了中国早期学术发展的整体历程。

参考文献

- 1 李景文.刘向文献编纂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 2 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 七略佚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9.
- 3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4.
- 4 伊·谢·科恩.自我论:个人与个人自我意识[M].佟景韩,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54—55.
- 5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3320.
- 6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869.
- 7 白寿彝.中国通史:中古时代·秦汉时期 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093.
- 8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01.
- 9 李景文.刘向文献编纂活动对中华学术传统的贡献[N].光明日报,2018-5-30(14).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收稿日期:2021年6月4日

修回日期:2021年9月7日

(责任编辑:支娟)

Panoramic Display of Liu Xiang's Literature Compilation Activities

—On Li Jingwen's Research on *Liu Xiang's Literature Compilation*

Wang Jiaqi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the study of *Liu Xiang's Literature Compilation* examines the royal literature compilation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Liu Xiang during the Period of Emperor Cheng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comprehensively discusses the whole process of his literature compilation activities. Starting from Liu Xiang's literature compilation activities, compilation thoughts, academic contributions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the book puts forward the mode of “proofreading and editing” that he adopted when sorting out official books. Looking back on the history, taking the political history and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s the background, the paper re-examines Liu Xiang's Confucian thought and his willing of helping the world in his literature compilation work. It also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Liu Xiang's contribution to the opening of the era of decided edi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literature discipline, and highlights Liu Xiang's historical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book system and academic history.

Keywords: Liu Xiang; Compile; Collate; The Era of Decided Edition